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 党员干部读本

武国友 编写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 党员干部读本

武国友 编写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 80 年党员干部读本

武国友编写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1.3

ISBN 7-5051-0551-5

I. 中…

II. 武…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学习参考资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556 号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党员干部读本

武国友编写

责任编辑: 高晨野 封面设计: 李惠民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27 地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电话: 64037152

印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公司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4 次印制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ISBN 7-5051-0551-5/D·210

定价: 17.50 元



目 录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民主

革命纲领	(1)
近代中国革命的启示	(3)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 传播	(10)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6)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人 运动	(19)

二、投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19)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26)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33)

三、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

创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	(41)
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及其对 革命的危害	(51)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62)
为争取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68)

四、做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76)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84)
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93)
五、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	(102)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02)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第二条战线的发展	(117)
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酝酿 ..	(123)
六、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35)
稳定政局，平稳物价和统一财经	(135)
抗美援朝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多方面展开	(141)
向社会主义过渡	(148)
七、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57)
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	(157)
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162)
指导思想的“左”向发展与探索中的曲折	(166)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	(173)
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误区	(181)
八、“十年”磨难与抗争	(188)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88)

所谓的“一月革命”与二月抗争	(192)
林彪集团折戟沉沙	(194)
铲除“四害”结束“文革”	(203)
九、徘徊前进与伟大的历史转折	(210)
“两个凡是”的提出与关于真理 标准的讨论	(2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215)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	(221)
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全面展开	(226)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之纲领	(226)
营造有利的建设环境	(231)
平息政治“风波”，加强治理整顿	(237)
十一、跨入改革开放新阶段	(243)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目标	(243)
加强宏观调控，制定跨世纪远景 规划	(250)
推进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喜迎 港澳胜利回归	(255)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建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未来	(265)
后记	(277)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 民主革命纲领

近代中国革命的启示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以鸦片烟土和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各国接踵而来。它们抱着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掠夺资源和攫取更丰厚的利润这一目的，对中国进行残酷压榨和疯狂掠夺。它们的入侵虽然也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使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却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它使中国这个古老社会自身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了。

自那时起，近代中国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成了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因此，反抗外来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便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题，同时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祖国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至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此伏彼起，就声势、规模和革命的深度来看，是越发走向深入，然而却一次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抱恨终天。

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而言，它已经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并力图努力以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纲领。

2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确实推翻了清王朝，并于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它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是一次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历史性变革。那时的中国人着实为此而感到兴奋。辛亥革命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然而，辛亥革命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它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中华民国刚呱呱坠地，又不得不在痛苦中挣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统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广大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次任何大的社会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



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乃至辛亥革命这些斗争历程来看，农民革命不可能使近代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改良道路也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其没有一个明确的、完整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并将其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农民领导的革命所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承担，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它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已经向新生的无产阶级发出了召唤。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相反，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无忌相回应，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亦愈演愈烈。旧的封建政治制度延续着，而新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却又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思想界重温旧梦亦搞什么“尊孔读经”。那时，真可谓活剧、闹剧、丑剧一幕紧接一幕。

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他们深感旧的道路已经无法走通，欲求中国

独立富强，必先启蒙。于是，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它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为主要阵地。思想锋芒直指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并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撼动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被打开，于是举国上下呈现出一股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在封建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里，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当时所说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所倡导的科学除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

诚然，用资本主义文明反对封建主义文明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暴露出来。1914年到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暴露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接受尔后传来的马克思主义。

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在苦闷中抉择、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诞生了。这个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使苦闷彷徨中的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此之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的名字和某些著作片断。但那时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深受封建压迫和贫穷落后之苦的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颂扬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他盛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劳工主义战胜”，“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



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人的路。

走十月革命之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此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适当的条件。第一，这时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壮大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并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第二，随着近代以来新式学校的增加，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经成为某种必然。

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之路，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首开其端。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派代表出席。会上，不但中国代表提出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遭到拒绝，更甚者会议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

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对于这种屈辱的和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于是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①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受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对此，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走学生32人。5日，为抗议反动军警暴行，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得到各地学生的热烈响应。由于反动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斗争遇到严重困难，于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武汉、南京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

^①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



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参加了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它以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标志。

8 在五四运动中，由于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了工人阶级。而这种认识又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关注工人运动的结果，是促使他们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办学校、办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开始怀疑以至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转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于是，五四运动后，形成了宣传社会主义的高潮。正是在这个高潮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这篇文章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较大进步，它已具有了相当完整的形态。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杨匏安、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各种思潮的界限也并不很分明，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各种流派和观点一时间分然杂陈。由于各种学说纷纷传入，各种观点也颇多歧异，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便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并“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商定，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即一批马克思主

义的图书、报刊也在国内出版发行。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正当此时，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于1920年三四月间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1920年9月，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湖南学生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应该起而仿效。在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

10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对各种学说的反复比较，最终确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加之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于是创建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

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此后，李大钊等做了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筹建工作给予了热情帮助。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了建党问题。

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首先诞生。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习惯上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1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法国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